

美国大选第二场辩论 候选人刀刀相刺

美国总统大选第二场辩论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举行。两位候选人辩论前夕都被曝出有损各自形象的“黑材料”。



澳一女学生向朋友投毒 接受采访时竟然大笑

一名澳大利亚的女留学生Jessica Wongso向朋友的咖啡下毒导致对方死亡，近日她在法院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你下毒了吗？”她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咧嘴大笑起来。



它们负责搞笑 动物也娱乐

一组动物搞笑镜头网上走红。比如左图：当她生气骂你时，你要做到一言不发，用沉默对付一切。人们看了之后内心莞尔。



日本老奶奶一生折腾自己 88岁终于成网红

西本喜美子是日本新晋网红。她老人家靠的绝不是美白磨皮看角度、耍宝卖萌段子，而是一张这样的照片。折腾自己，娱乐大家。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国际知名政治哲学理论家贝淡宁，将于明年1月出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这位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在中国内地大学担任政治学和伦理学全职教授的外籍教师。他的英文专著《贤能政治》系统阐释了政治尚贤制这一中国政治模式，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关注。今年9月，该书中文版面世，再次引发热议。9月25日，记者就此对其进行了专访。

贝淡宁：中国贤能政治值得西方借鉴

□ 本报记者 肖芳



贝淡宁最乐于向人提起的一个新身份，是儒家学者。

远在1000公里以外的灾区做志愿者，帮助分发救援物资。

选贤任能是中国政治传统

当被问到为什么来到中国、研究儒学时，贝淡宁“故作神秘”地回答：我对这个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你想听哪一个？

第一个是“一本正经的、作为学者的答案”：1980年代末，贝淡宁在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对一种批评自由派个人主义的哲学“社群主义”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但是，社群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被认为是自由派传统的异端。偶然接触到儒学后，他兴奋地发现，儒家学说和社群主义有着相同的核心命题，即都认为好的生活取决于良好的社会关系。于是，他便开始关注儒学的源头——中国。

第二个是“作为男人的答案”，也是“最简单的真相”：1989年，贝淡宁在牛津大学遇见了来自中国的女研究生宋冰，两人一见钟情。宋冰特意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而哲学，恰恰是贝淡宁的兴趣所在。相爱11个月后，两人喜结连理，组成跨国家庭。“我的爱从此推广到我们的孩子、我妻子的家人、我们在中国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最后到整个国家。”贝淡宁说，“我没有计划或者控制这个过程，但它确实发生了。”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倾向于认同儒家理想。”贝淡宁认为，如果中国重新恢复儒家理想的话，很多不好的现状就能得到很大改善。他非常认同儒家关于“和”的理念：“如果我们的社会很自由，但家庭关系普遍不好，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很多暴力事件发生；如果不能求同存异，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会不停地打仗；如果没有和谐，人类就会一直破坏自然，导致很多灾难性问题。”

在儒学众多领域中，作为政治哲学理论家的贝淡宁，最关注的是儒家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政治尚贤制。

按照儒家标准，理想的社会需要选拔有能力、有道德的领导，正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个好的政治体制的关键，就在于选拔德才兼备并能带领社会前进的领导者。

选贤任能是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的政治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曾将优胜者取得功名与权力的途径制度化。这种科举制在帝制彻底终结之前的1905年被废除。但是，在过去的30多年来，考试体制又被重新确立起来。贝淡宁认为，今天中国的干部遴选和考核制度，“或许可以被视为回归到选贤任能的儒家传统”。

贝淡宁说，他一开始写的有关政治尚贤制

的文章，往往是受到儒家哲学而非现实政治的启发。但在过去几年里，他逐渐认识到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具有尚贤色彩，这“也许部分要归因于清华大学的优等生越来越多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将政治尚贤制的哲学思考更加直接地与中国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展开了研究。

最终，贝淡宁将官员选拔的“中国模式”归纳为“贤能政治”。他认为，正是这一方式使得选拔出的官员在知识水平、社会技能和公共美德三个方面高于平均水平，从而带领中国取得了现今的经济成就。

“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存在缺陷

对中国贤能政治进行了持续5年多的系统思考和研究后，贝淡宁于去年夏天出版了《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英文版）一书。正是这本书，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是一部系统阐释政治尚贤制这一中国政治模式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一部探索西方民主制之外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著作。在本书中，贝淡宁批评了选举民主制存在的四大缺陷（少数派暴政、多数派暴政、选民共同体暴政、竞争性个人主义暴政），认为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很难遴选出优秀的领导者。而选贤任能的政治尚贤制，更加适合像中国这样面临复杂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大国，甚至也能成为西方可借鉴的替代方案。

该书出版后，很快在英语世界引起争论。贝淡宁遭到一些批评家的抨击。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将贝淡宁称为“中国体制的崇拜者”，宣称该书是对民主的攻击和贬低。

为何会招致如此多的批评呢？贝淡宁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对民主观念有着“教条式依恋”：他们认为一人一票是挑选政治领袖时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方式，其它任何方法在道德上都是不正当的。

这些反对之音，并没有让贝淡宁感到意外。他说，他自己从小接受的政教教育就是无论一个国家多小或有10亿人口，只有一种选拔领导的合法方式，那就是一人一票这种“一刀切”的制度。长大以后，经历了几十年的对自己道德体系的冲击，他才开始质疑从小就形成的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等自认为普世的价值观念。因此，“让西方人一下子就抛弃他们视为几乎具有神圣宗教色彩的政治价值观并不容易”。

“如果不是因为在北京呆了10多年，我根本不会写这样一本书。如果在20年前阅读本书，我或许会对自己的某些观点感到震惊。”贝淡宁表示，中国对西方民主的了解，要远远超过西方对中国政治尚贤制的了解，他写这本书是希望作为一种再平衡的努力。

在本书中，贝淡宁回顾说，一人一票的民

主制度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但在二战前，其实并不是这样。19世纪有位自由主义者叫斯图亚特·密尔，他觉得自由主义的标准——尊重个人的权利很重要，但每个人的能力、受教育程度都不尽相同，应该给受过教育的人们更多的投票权，比如大学教授应该给3票。那时候，西方人还可以讨论甚至接受这样的观点。

可是，现在的西方却不允许这种讨论出现。他们教条地认为一人一票是唯一合法性的制度。“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不可以讨论其他选举方式。大家都承认美国的民主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改进的基础还是一人一票。因为一旦获得投票权，就不会有任何人愿意放弃。”

贝淡宁则认为，在一个大国，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是有问题的。从道德视角看，选民投票时应该考虑公共福祉，因为投票的结果不仅攸关其自身，还会影响到其他人。但事实上，选民投票时常是利己主义的，倾向于优先改善自己的境遇，更何况还有许多经济上无法自立的投票者。此外，富人往往更理解经济规律，因此能操纵选举以自肥。

此外，民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它把投票权仅赋予国家边界内的成年选民，可是受选举结果影响的不仅限于这些选民，还包括其子孙后代和国界之外的非选民。“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欧洲和美国，民众一再投票支持低税收和高福利，无视这会掏空国家的未来。至于威胁人类未来的地球变暖问题，在民主制度上更不可能有出路。”

“看美国大选的政治辩论，我真的觉得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不讨论什么实质性内容。”贝淡宁认为，虽然对于中国来说，开放的心态、全民的参与也非常重要。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需要选拔优秀的领导层去面对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例如解决贫困、消除贫富差距以及治理环境污染等。

贤能政治更适合中国

在谈到政治制度时，不少学者仍沉迷于“民主”或“独裁”的陈旧二分法。但学者张维为指出，21世纪竞争的关键在于“良政”还是“劣政”。对此，贝淡宁表示赞同。

他认为，在选拔政治领导人方面，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选贤任能”的中国模式，即“三层架构”模式：基层的“民主”、中间层的“试验”和顶层的“精英”。

贝淡宁解释说，在基层实行民选，是因为基层都是规模较小的社群，比如一个村庄、一个社区，民众熟悉当地亟需解决的问题，也知晓候选领导人的能力和性格，因此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但如果是选拔高层领导人，民众就难以知晓其能力和道德，因此就需要考虑直接选举之外的其它选拔方式。在理想状况下，应该选贤任能的原则，即以明确的制度保证最后胜出的领导人德才兼备。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高考，对大多数人来讲，进入高层政府的第一步就是要考上大学。第二步则是入党，大学里入党竞争十分激烈，而党组织最欢迎出身名校、学习成绩好并担任干部的学生。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建立了公务员录用制度，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中国最热门的考试。

那些想到政府部门工作的人，首先要参加公务员考试，通常是成百上千个申请者竞争一个初级岗位。然后，他们必须在基层表现良好，经过一级一级的严格考核，才能进入高层政府部门。这个考核过程包括在贫困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培养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

“中国的官员选拔体制是当今世界竞争性最激烈的体制。”贝淡宁说，平均一个官员的升迁选拔时间长达30年之久。在这个“折磨人”的过程中，官员们可以专心致力于增进知识和业绩，而无需为争夺选票浪费时间和金钱，因为只有那些表现卓越者才能晋升到高层。

贝淡宁认为，这种高层官员选拔模式，使得中国共产党逐渐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精英化的专业组织。他们可以跳出眼前利益，基于长远利益制定施政方针。例如，中国政府根据五年计划实施一些长远政策，如清洁能源、高速铁路、西部大开发等等。

“这种官员选拔模式，契合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并适应于现代社会的需求。”贝淡宁表示，中国应该在既有的模式下努力探索，而不是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去缘木求鱼。

腐败问题不解决，贤能政治会崩溃

当然，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虽然中国贤能政治的成功非常明显——领导数亿人摆脱贫困，创造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但在实践中，贤能政治并非完美无瑕，其中最危险的就是腐败问题。

贝淡宁坦承，“政治学不是科学”，虽然贤能政治在选拔领导人时注重其道德品质，却无法保证他在获得权力之后，还会一如既往地保持这些品质。

尽管腐败在各个国家普遍存在，但贝淡宁认为，中国解决腐败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合法性。

在西方，腐败问题不会动摇国家政治制度的根基，因为如果哪个官员腐败了，民众只要在下一届把他选下去就可以。但在中国的贤能政治体系中，领导人的合法性即便不是全部也至少大部分来源于他们被视为品德高尚和献身公益的人。“可以说，如果不解决腐败问题，贤能政治就会崩溃。”

贝淡宁观察到，以往大部分中国人对政治的不满大多集中在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上。但是，近年来中纪委查处的几起震惊全国的大案显示，腐败已经蔓延到了高层，这更直接威胁到现存政治体制的根基。正因如此，中国近几年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打了很多“老虎”，也抓了很多“苍蝇”。这些行动重新树立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在国际上也广受好评。

那么，该如何防治腐败？提高官员工资，被认为是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并被新加坡成功实践。贝淡宁不仅对此表示认同，甚至还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了同样的案例，那就是雍正年间的“养廉银”。

大清开国，沿袭明制，官吏俸禄极低，多数仅能养家糊口。雍正皇帝认为，官场腐败难以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员收入太低。因此，他决定给地方官员发放养廉银，让他们可以凭光明正大的收入体面生活。事实证明，这一举措颇有成效，雍正一朝，吏治相对最好。

“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贝淡宁提醒说，单纯地提高官员工资并不能治理腐败，还必须严格的配套举措。正如与养廉银同时并生的，是雍正皇帝严厉的禁革陋规。

在发放养廉银的基础上，雍正开始明令禁革一切节礼。他严厉警告各级官吏，“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问，重治其罪。”他说到做到，下手无情。“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就此洗手。养廉银制度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的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高薪养廉，但也要知道，新加坡官员没有任何特权。”贝淡宁表示，减少官员特权、强化权力约束、加强监督等，都是治理腐败的好手段，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已经作出了很多有效的探索。

“但是，如果政治领袖本身缺乏社会责任和自我约束力的话，光靠这些法律手段是不够的。”贝淡宁认为，中国目前解决腐败问题主要还是靠法定的方式，即让官员知道腐败的代价巨大，从而不敢腐、不能腐。“但是从长期来看，要想让官员‘不想腐’，我觉得更需要用儒家的方式。”

“慎独，是儒家先贤倡导的一种自我修炼方法，也应该成为反腐思想教育的指导。”贝淡宁建议，要让官员提高个人修养，即使无人监督，内心也不想腐。

因此，谈起儒学近年来在中国的复兴势头，贝淡宁表现得十分兴奋。他认为，儒家复兴的原因，从本质上说，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经济力量的增强必然伴随着文化上的自豪感。“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到了该确认自己文化遗产的时候了。因此，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复兴并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事情。”

在他的眼里，这种复兴迹象随处可见：政府领导人在讲话中喜欢引用儒家经典语录；评价共产党员的标准之一是否尽到家庭责任；很多地方的公交车厢里张贴着《论语》语录；山东建立“乡村儒学”讲堂，让大学教授到农村去讲授儒家传统美德……

“这个过程很慢，可能许多年以后才会看到结果。”但贝淡宁表示，“我对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悲观，我觉得一直在进步。”